

戴震辨伪成就述论

徐道彬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戴震是清代引领一时学术风尚的考据学大师,治学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古人作伪之书能够博综群籍,参互考证,使伪者自出,真者自存,充分体现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治学风格,其态度和方法对于后来学者有着深刻影响。然而,关于戴震在辨伪方面的实践及观点,至今无人提及。本文从实例出发,略述戴氏在辨伪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戴震;考据学;辨伪成就;影响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7)01-0077-04

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以辨伪求真为基础工作,如果凭借的资料实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之而伪,研究工作便算白费了。古书辨伪的历史很悠久,宋代学者疑古最勇,辨伪之书多,但主观臆断亦多;清人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和态度,较之前代审慎而周密。他们一方面崇尚古学,另一方面又善于辨伪,治学以实事求是为本,以信而有征为据,此中尤以戴震为代表。戴震治学重视辨章学术,考订真伪,对古人作伪之书和原为真书而被后人妄疑者,皆能博考参证,使伪者自出,真者自存,覃思精勘,深究本源,以达辨伪存真之效。从戴震的辨伪实践和观点里,能充分体现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1] (6P373)}的为学风格,是则正之,非则驳之,此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对于后来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戴氏在辨伪方面的实践及观点至今无人提及。本文从实例出发,略述其在辨伪方面的成绩和影响。

一、承继前修,补证考伪

清儒辨伪杰出者当首推阎若璩,其《古文尚书疏证》引经据史,考证周密。后续补证者,有惠栋《古文尚书考》、戴震《尚书义考》、程廷祚《晚书订疑》、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等接续证伪,使伪古文《尚书》已成定讞。

戴震《尚书义考》虽为考证疏义之作,然于辨伪

之事多有涉足,可以补证阎氏不足。如《尧典》:“帝曰:我其试哉”,戴氏《尚书义考》案:“‘我其试哉’之上,孔颖达云:‘马、郑、王本说此经皆无“帝曰”’,《史记》于此作“尧曰吾其试哉”,东晋所出之古文《尚书》,殆因《史记》之文加之耳。”^{[1] (1P68)}戴氏以马、郑、王本之言与《史记》所载对校,推定伪古文《尚书》“因《史记》之文加之”。东晋所出古文不明史实,故而沿袭致误,露出作伪马脚。

又同书卷一“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下,戴案:“百姓之称,周时犹不指民,而谓唐虞时即以指民,非也。‘罔咈百姓’,语见伪古文,不足引以相证。”^{[1] (1P29)}戴氏由上古典制考证的角度,指出“百姓”在上古时不称民众,而为“百官”之名。伪古文不明古义,显为误用。此条辨伪又见于《毛郑诗考正·天保》,云:“韦昭注《国语》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经传言百姓,皆此义。惟东晋梅赜奏上之《古文尚书》谓庶民为百姓,与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中异指。”^{[1] (1P617)}此处虽为补证《尚书义考》,也为阎氏辨伪加一力证。

戴氏于古文《尚书》辨伪极为留心,考证古书中随时指正。如《水地记初稿·济水》中评《水经注》:“今济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下,戴注:“北魏时,济水源为轵县境,当云出轵县西北平地。东晋《古文尚书》孔传云:‘泉源为沔,流去为济’。酈道元殆袭其文欤?孔冲远《义疏》云:‘见今济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余里。’”^{[1] (4P224)}同卷又于《水经》“菏泽水自泽别,东入于泗”下,戴注:“《汉志》山阳郡湖陵下云:‘《禹贡》浮于泗、淮(戴按:当作淮、泗)通于河(戴按:当作荷),水在南’。许叔重《说文解字》荷字下云:‘荷水在山阳湖陵南,《禹贡》“浮淮、

收稿日期:2006-04-02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0601026C)

作者简介:徐道彬(1966—),男,安徽寿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文字学、古文献学。

泗，达于荷”。今《禹贡》及《汉书》‘荷’皆转写讹作‘河’。惟《说文》足资证实。东晋《古文尚书》孔传曰：‘菏泽在湖陵’，袭叔重之言。菏泽水者，以为泽之所在，谬矣。”^{[1] (4P236)}此二例分别从温城与軹县的地名辨析，以及荷与河的文字考证来考察伪古文作伪行迹。戴氏所言对东晋《古文尚书》的继续辨伪又提供了有力证据。

《经考附录》是戴震研治群经的心得体会，其中也有对伪《古文尚书》考论的文字，间有卓见按语，颇得其正。如《经考附录·臧孔安国书传》云：“孔冲远引《晋书》言，梅赜所上孔氏《古文》出于郑冲。必当时赜进书饰辞，而史录之，非实能考得其源流也。至以为王肃似私见《古文》，而阎百诗证之为作伪者窃王肃，是固然矣。钱编修晓征尝与予论及此，疑《古文尚书》乃肃私为之，故东晋始出。肃未见《逸书》十六篇，乃博采传记所引《书》辞，为伪书二十五篇，假托于孔氏而为之传，其意欲以证己之言，而难郑。盖即伪作《孔子家语》之故智耳。非王肃无此淹博，亦不能如此善摹古也。肃既自为今文作解，又为伪《古文》书传，使后人得之，惊服其解之精确，与古人合。

《家语》、《古文尚书》皆肃伪本。其近理处，摹古处，及有时背道处，俱相类。斯言似得其实。”^{[1] (2P466)}

戴震曾与钱大昕共论东晋《古文尚书》为王肃伪作，批评孔疏未能“考得其源流”，肯定阎氏辨伪之功。同时又客观公允地评价王肃“淹博”、“善摹古”，采摭经注，多存古义而时有“与古人合”者，指斥其未见逸书十六篇而博采他书引《书》之语，“有时背道”，文过饰非，有明显作伪之痕。

《经考附录》所论伪《尚书》，多为摘引前人辨伪之言，取舍之间已见其意，并在《古文尚书》的许多伪篇目上冠以“臧”字，以示己意，如《臧大禹谟》、《臧五子之歌》、《臧胤征》、《臧仲虺之诰》、《臧汤诰》、《臧伊训》、《臧太甲三篇》、《臧咸有一德》、《臧太誓三篇》、《臧武成》、《臧旅獒》、《臧微子之命》、《臧蔡仲之命》、《臧周官》、《臧君陈》、《臧毕命》、《臧问命》、《臧孔安国序》、《臧序所言坟典丘索》、《臧序所言科斗书》、《臧序所言篇卷》、《臧序所言会国有巫蛊事》、《臧孔安国书传》、《臧书传所言水道地名》、《臧古虞书》、《臧朝鲜日本尚书》等，皆采摭前修，引申触类之说，或将阎若璩、冯景、梅鹗、姚际恒、王应麟、顾炎武、朱熹、叶适、朱彝尊之论参互考校，排比钩稽，而其意自明；或间加案语，曲致其思，所引所论多匡谬正讹，必有依据。如《臧古虞书》一条引晁公武、王应麟语之后，云：“郭忠恕既定《古文尚书》并《释文》，而又存其字于《汗简》中，以六书之义考之不合，殆好奇所至，伪托之前人也。梅赜所上孔氏《古文》，且属伪作，况又因其书，而傅会为隶古者乎？”^{[1] (2P470)}又如《臧胤征》引阎氏语而又详加

补证云：“《左氏传》引《夏书》‘辰不集于房’。而东晋《古文尚书》加‘季秋月朔’者，由误解‘房’字，且傅会《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之文。不知虞夏时，季秋日在箕尾之间，食不得在房也。《月令》乃周末日躔所在，校虞夏差及一次，阎百诗推九月日食在氐末，五月在东井，亦未计岁差而云然。杜元凯注：‘房，舍也’最确。‘房’，犹皆火房也之房。”^{[1] (2P432)}戴氏从考证上古天文历法的变化情况切入，认为鲁太史引以为正阳之月孟夏，而东晋《古文尚书》系之季秋，因误释“房”字而露出破绽。阎氏于此亦未深考，戴氏继事易工，于阎氏《尚书》辨伪又添一证。

戴氏辨伪极重证据，未尝率尔立论，常云：“凡立言者，慎之又慎，有疑则阙，毋凿说，毋改经，其斯为今日读书之法律与。”^{[1] (2P327)}“非周察而得其实，不敢以为言；非精心于稽古，不敢轻笔之书。”^{[1] (6P466)}针对前人为逞私臆而改经作伪之迹，戴氏皆细加辨析，如《经考附录·孔子家语》题下附记：“今则王肃贋本。”并引《汉志》认为《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以为非当时所有之《家语》。又引马昭、郎瑛以为王肃伪作之言相证。戴氏在《家语贋本袭大戴记》中云：“《大戴礼记》多同《家语》者，《家语》出于王肃窃取是书为之。史绳祖引《公冠篇》‘陛下显离先帝之光耀’，已下俱为成王冠辞。盖读书不审章句，遂加讥评。书中明言：‘考昭冠辞’。而史氏误连成王冠辞读之，何也？此误要不始于绳祖，王肃窜改《大戴记》及诸书以为《家语》，已并章句不辨矣。《家语》袭《大戴》，非《大戴》袭《家语》。就此一条，亦其明证。而史氏乃曰：‘当以《家语》为正’，岂不谬哉。”^{[1] (2P544)}

此段文字较为完整地出现在《四库全书总目·孔子家语》条，由此也可推测《孔子家语提要》也为戴氏所作。戴震之后的孙志祖《家语疏证》、范家相《家语证讹》承前人之说，把《孔子家语》是王肃所伪作的公案定讞了。

戴震在四库馆期间对所接触到的许多古书首先条别参证，辨明真伪，对所校官书从撰人名氏、著述时代、著录传授、思想渊源、材料来源、原书文体等方面综合考辨，体现出辨伪方法的高明和见解的审慎。如《仪礼释宫》，有言为朱熹所作，戴氏辨析云：“考《朱子大全集》亦载其文，与此大略相同，惟无序引。《宋中兴艺文志》称朱子当与之校定《礼》书，疑朱子固尝录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为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犹苏轼书刘禹锡语题姜秀课册，遂误编入轼集耳。观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于《乡饮酒礼》‘荐出自左房’，《聘礼》‘负右房’，皆但存贾疏，与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证也。”^{[1] (6P622)}

戴氏从著录传授和思想渊源考察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中所释二段文字与《仪礼释宫》释言不同，

证其不为朱子作,推测为汇录朱子文集者误入朱子集中,如此类事情前代亦不乏例证。戴氏慧眼独具,辨析精当,情理俱宜。

二、辨伪用伪,启发后学

戴震治学主张淹博、识断、精审,精深贯通于小学礼制,天算舆地,以为治经之用。对于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各个时代出现的托名之作,既能考明是非,又能适当采用。如《续天文略》云:“世所传《甘石星经》,出于后人伪托。其积古已来,由略而详者,《天官书》集其大成。篇内云:‘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又自序云:‘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然则迁述《天官》,即所谓唐都分其天部者也,虽兼存占气、占岁之说,而以星为本。”^{[1] (4P45)}《甘石星经》旧题汉甘公、石申撰,实为后人伪托之书,撰人名氏及时代皆不明,内容不及《史记·天官书》。尤其对于象《步天歌》之类伪书,因不明其时其人,故用之于考证汉历则为用非其时,言而无信。《中国伪书综考》就此事论云:“宋以后称它为《甘石星经》,但该书有唐代地名,而且有巫咸氏的星官。因此它与战国、西汉所流传的原著完全是两回事了。”“《步天歌》首创把整个天空分三垣二十八宿,共三十一个天区,每区包含多少不等的星官和星数。此区分法和《晋书·天文志》以及《隋书·天文志》完全不同,而与宋代以后的天文书大体相同。”^{[2] (P621)}戴氏见闻既博,辨别尤精,得一书必推求本原,稽核伪谬,其说也多为今人所接受。

戴氏辨伪别异多随处而论,言简意明,不作长篇大论。如《策算》一书以数学考据方法研究历法时差问题,认为后汉所用为《四分历》,而《史记·历书》中的《历术甲子篇》与《四分历》相同,便推论今《史记》之文也有伪托司马迁者。云:“《四分历》推二十四气,每一气十五日三十二分日之七,故又以三十二为日分。以二十四乘十五日,得三百六十日,适六甲子。以二十四乘余分七,得一百六十八,是为日余。以三十二除日余,得五日,余八,是为大余五,小余八。《历术甲子篇》,太初元年又记大余五,小余八,即此数。《史记》当用《太初历》,不当用《四分历》。以此知《历术甲子篇》乃后汉人窜入,非《史记》本文。”^{[1] (5P23)}《历术甲子篇》即为后汉之《四分历》,不当出现在《史记》中,《史记·历书》用《太初历》,不应与《四分历》同,故《历术甲子篇》为后人窜入《史记》者。戴氏用数学考据方法辨讹祛疑,剔除《史记》中虚伪的部分,纯洁《史记》本身,提高其历史考证资料的价值。

学术研究最紧要处在于实事求是,伪书虽然不是假托的某时某人所作,但其中所保存下来的古代资料,于今亦有非常之价值。梁启超谈伪书价值云:“书

断不能凭空造出,必须参考无数书籍,假中常有真宝贝,我们可把它当作类书看待。战国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秦始皇焚书以前的资料,汉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董卓焚书以前的资料,晋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八王之乱以前的资料。”^{[3] (P188)}实际上,戴震在辨伪的同时就已充分认识和利用伪书,尝云:“至孔安国传,虽晋人伪托,大抵袭用古注。”^{[1] (1P11)}又云:“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辞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1] (6P277)}对于汉唐以前的伪书,戴氏能以正确态度重视其中的史料价值。《六韬》、《素问》、《淮南子》等书或托名伪造,真伪不明,或疑晦无本,末为典则。然其皆源自古史或剽窃古书,因此上古传说及史料赖以存古者不少,其中价值不可一概抹去。辨别伪书应实事求是,而正确地利用伪书也是实事求是,戴震能在辨伪的同时又用伪书以为相应之考证,正是其治学求是的体现。

《小尔雅》旧题为楚孔鲋撰,戴氏极力辨驳之,以为汉唐人伪托孔鲋之作,但在辨伪的同时却又常引《小尔雅》作为考证资料。其《书小尔雅后》一文云:

《小尔雅》一卷,大致后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学遗书也。如云“鹄中者谓之正”,则正鹄之分未之考矣。“四尺谓之仞”,则筑宫仞有三尺,不为一丈,而为及肩之墙矣。“浚深二仞”,无异洫深八尺矣。其解释字义,不胜枚数,以为之驳正,故汉世大儒不取以说经,独王肃、杜预及东晋枚瓒奏上之《古文尚书》孔传,颇涉乎此。^{[1] (6P293)}

古射侯之中为鹄,鹄之中为正,正之中有质,正虽在鹄中,但与鹄各自为名,又有尺寸大小之分。长度单位“仞”,上古随时代而有变更。钱玄《三礼词典》云:“《小尔雅·度广》:‘四尺为仞’。此或均为汉以后度制之更变,故有差异。”戴震从本书所载名物制度上参互考证,不见汉人书征引之事,惟王肃、杜预引之,并摘取《小尔雅》中涉及度量衡的内容,逐一分辨,以明其为袭取汉魏古注,皮傅掇拾而成,非为“古小学遗书”。其后臧庸撰《小尔雅征文》阐发戴说,云:“善乎,戴东原氏之论《小雅》也……余初见戴氏之言,而叹其识之伟,论之精。既考前人之引此书者,以为始於东晋郭景纯。夫经学至魏晋改师法,如王肃、伪孔、何晏、杜预,孔晁、郭璞,皆喜新好异,不经师匠者也,故其言往往互相祖述。”^[4]《中国伪书综考》云:“尽管《小尔雅》是一部伪托之作,其成书年代亦在汉唐之际,但它所收词条均系《尔雅》所无,其性质与功用亦与《尔雅》相似,对我们现在阅读古籍,研治古汉语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工具书。”^{[2] (P224)}《小尔雅》之真伪未为定说,然其成书于汉唐,采录和保存了大量小学资料,也有许多《尔雅》遗漏者赖此以传世。《小尔雅》虽久有其书,

但被重视和认真研究,至清代才发展起来,戴氏确为始作俑者。其后胡承珙、宋翔凤等或疑或驳,由此引发争论,而将《小尔雅》研究推向高潮。

戴震力辨《小尔雅》之伪而又能加以利用,以同时代之资料证明同时代之问题,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思想方法。如《经雅》“乌”条云:“乌、鸞见经,黑乌见《夏小正》,卑居、白脰乌见《尔雅》,燕乌见《小尔雅》,《尔雅》单作燕。雅见《说文》,《小尔雅》作雅乌。”^{[1] (2P641)}此中以《小尔雅》补证《尔雅》、《说文》,求得名物称谓之本来。又《考工记图》卷上“軋谓之衡,衡下乌啄谓之軋”下,戴氏博综群籍,稽核异同,引《左传》及服虔、杜预注文以证己说。又引《说文》:“軋,軋下曲者。”《小尔雅》:“衡,扼也。扼上者谓之乌啄。”《释名》:“马曰乌啄下向。又马颈倾乌开口向下啄物时也。”^{[1] (5P349)}戴氏把托名伪作的《小尔雅》在经籍考证上的价值与《尔雅》、《说文》、《释名》齐同视之,一面指证其伪,一面又能适当利用,使之各得其所。又如《方言疏证》卷四“檐褕”条征引伪书《小尔雅》,使疏证持之有据,内容更为完满。《小尔雅》:“檐褕谓之童容。布褐而紩之,谓之蓝缕。”^{[1] (3P66)}此中用《小尔雅》疏证《方言》可见于时于义甚为切合。又同卷于“蔽膝”条引《释名》、《广雅》、《释文》之文及《小尔雅》:“蔽膝谓之衲”^{[1] (3P67)}相证,众据共证,略无抵牾,疏证甚为完备。戴氏虽辨《小尔雅》为伪,却能以客观的态度和历史的目光对待之,非如有些学者,一知是伪书,便完全弃之不用,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失却公正、客观、求是的态度。戴氏既能认识到伪书消极的一面,又能从积极方面寻其有益之用,真正体现出能够识其本而明其用,“空所依傍”,“不以己自蔽”的精神。

《水经》旧题汉桑钦撰。戴震通过考证书中制度名物,地名称谓变迁以及原书佚文,文体词例等方面提出其为三国人所撰。云:“《水经》作者,《唐书》题曰桑钦,然班固尝引钦说,与此经文异。道元注亦引钦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经》。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已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寻文句,大抵三国时人。”^{[1] (6P631)}戴氏所言简明扼要,其理据根柢于长期的精深探讨。戴氏考辨从后人引书、史地称谓变化、前人著录之是非诸方面精研博讨,条分缕析,言之有据。《中国伪书综考》汇综诸说,于此论云:“目前,《水经》一书作者尚无定论,但不出汉魏人所作当可肯定。”^{[2] (P362)}所言与戴说同。

又如《五曹算经》,《唐书·艺文志》有甄鸾注和韩延注各五卷本,但不知作者为谁,清朱彝尊以为出自孙武。戴震整理考证后,认为虽然作者不明,当在北齐之前,有甄鸾为之作注。^{[1] (6P637)}又《孙子算经》,

《隋志》载有二卷,不著其名及时代,朱彝尊亦以为其法出于孙武。戴氏注:“彝尊之意盖以为确出于孙武。今考书内设问有云‘长安、洛阳相去九百里’,又云‘佛书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则后汉明帝以后人语。孙武春秋末人,安有语乎?”^{[1] (6P636)}戴氏由史志、书跋及算书内证材料而推论《九章算术》在西汉中叶以后,《五曹算经》不在汉时,《孙子算经》亦是东汉以后之书。数学史家钱宝琮对戴震在四库全书馆整理《算经十书》而能明辨其时代、作者、流传之事,多有赞同,云:“四库著录之书,撰提要者往往明斥其伪。震于算书之著作时代在提要中亦常有论证,盖时势使然也……震所取辨伪证据虽未能缜密,而敢于素无问题之三部算书,在提要中提出意见,其创辟榛芜之功,已足多矣。”^{[1] (7P643)}戴氏于古算书辨伪多由前人著录和本书内证详加辨析,确乎信而有征。也有未能顾及书籍历时演变和其他复杂因素而论说有可商榷处,后人多有指证,但戴氏“在提要中提出意见”,其创辟之功亦伟。梁启超云:“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尚未解决的十之六七。但解决问题固然是学术上一种成绩,提出问题,也算一种成绩。”^{[5] (P96)}梁氏之言亦可作为戴氏辨伪成绩的一种公允评价。

戴震辨伪之学既无理论著述,也无集中辨伪专书,而是在考据实践中随处对具体问题作具体辨伪或证真,故今人论清儒辨伪之事多不及之。梁启超云:“辨伪书的风气,清初很盛,清末也很盛,独乾嘉全盛时代,做这种工作的人较少。乾嘉诸老好古甚笃,不肯轻易怀疑。他们专用绵密工夫在一部书之中,不甚提起眼光超览一部书之外。他们长处在此,短处也在此。”^{[5] (P89)}梁氏之言虽未尽实,但从中也可想见乾嘉诸儒在辨伪方面的贡献都被湮没笼统于考据一事中了,今人论清儒辨伪只知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崔述《考信录》而不提曾及戴氏《经考附录》、《尚书义考》等,由此可见对清儒考据之学尤其对乾嘉诸儒辨伪贡献亦当细加辨别,有所发掘为是。

辨伪是考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戴震作为考据学大师,他善于总结前人的辨伪经验,或纠正,或补证,在清代辨伪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因为材料分散,后人论及此一方面便多有忽略。本文不揣浅陋,姑妄言之,望方家教正。

(英文信息转第2页下)

参考文献:

- [1] 戴震.《戴震全书》[M].合肥:黄山书社,1994~1997.
- [2] 《中国伪书综考》[M].合肥:黄山书社,1998.
- [3] 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演录二种》[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
- [4] 臧庸.《拜经堂文集》[M].1930年上元宗氏影印本.
- [5]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考订。这里只是略举几个例子，精彩之注释，随处都是。

连庆和我都是所谓“汉魏之际封建论”的支持者。魏晋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初期，《晋书》、《魏书》两书《食货志》中有关封建化的，注中便特别立意论述。如《〈晋书·食货志〉校注》第115-117页注⑤关于“私相置名”注，第119-122页注④、⑤关于“奚官”的注，第122-123页注⑦关于“使皆如屯田法”的注，第154-155页注11、20关于“食食客”、“荫客”的注，第157-159页注①关于太康年间经济情况的注，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大好论文，它详细论述了自由人、奴隶的依附化。

这种有考证、有分析、有概括、有独见的长篇巨“注”，在《〈魏书·食货志〉校注》中也很引人注目。如第221-222页注②论永嘉乱后北方人口，第229-231页注11论徒何种条，

指出“工使巧”上脱一“百”字，《魏书·太祖纪》“三十六万”“万”係“署”之误，第233-235页注22论述拓跋氏的封建化，第243-246页注①、③、④、⑤、⑦，论述逃户、绌罗户、杂营户、手工业工匠的依附民化、封建化等等，都是多有发明，有独立见解，长短不一的好文章。孔子曰“述而不作”。^①其实古人的述，正是古人的作。以述为名，以作为实。从注疏中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正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特点。连庆的注，实际上就是他的作，在《〈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中蕴含着连庆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学问。这也是他受古人影响寓作于注的大作了。

连庆去了。他一生坎坷，又不幸早逝。我和他叨在知遇之交，有义务宣传他的学问，但恨才短学疏，连反映他的学问的一篇序都写不好。暂时也只好如此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责任编辑：曹书杰）

① 《论语·述而篇》。

（上接第80页）

The describe for Dai Zhen achievement in Research of learning

XU Dao-bin

(The Literature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Daizhen is a distinguished master of research of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He's learning to identify and research where the ancient book to analyse out is very attention. So that there is the pseudo-out and there is real its own. This is fully realistic styles, His attitude and approach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scholars. However, no one mentioned on the practice about Daizhen achievement of research of learning. From a practical example of this approach, we would describe for Dai Zhen achievement in Research of learning.

Key words : Daizhen; research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influence

（责任编辑：刘 坤）